

## 后现代的文化、知识和语言批评\*

辛 斌

(南京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 江苏 南京 210097)

**摘 要** 后现代社会的经济、政治和文化为批评话语分析提供了关键的主题和概念,而葛兰西、哈贝马斯、福柯、德里达、巴特等的各种后现代主义理论对霸权斗争、全球化、知识和权力、语言和权力、生活世界的理性化、制度和生活世界的分离、制度对生活世界的殖民以及各种对这种殖民的抵制与反抗等的阐释为批评话语分析提供了一系列的理论和研究课题。批评话语分析产生于后现代的语境下,是对“后现代性”批评研究的一种贡献,其重点关注的是语言在后现代社会变化中的作用。本文旨在简单梳理后现代主义关于文化、知识以及语言批评的一些核心思想,以管窥后现代批评社会科学的社会观和语言批评观。

**关键词** 后现代;文化;知识;语言批评

中图分类号:H0-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7242(2016)03-0001-06

DOI:10.13978/j.cnki.wyyj.2016.03.001

### 0. 导言

对语言的批评研究至少可以追溯到前苏联巴赫金学派的 Volosinov 于 20 世纪 20 年代出版的《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哲学》(*Marxism and the Philosophy of Language*),但它真正作为一种立场或方法却是出现于 20 世纪 70 年代以后的西欧和拉丁美洲。当时英国的一些语言学家(如 Fowler, Kress, Hodge 等)深刻认识到在当代社会以批评的态度看待语言的政治重要性,开始了“批评语言学”(critical linguistics, CL)研究;1989 年 Fairclough 的《语言与权力》一书的出版标志着“批评话语分析”(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CDA)的开始。Chouliaraki 和 Fairclough(1999:2-3)认为批评话语分析产生于后现代的语境下,是对“后现代性”批评研究的一种贡献,其重点关注的是语言在后现代社会变化中的作用。他们将批评话语分析视为一种批评社会科学,指出话语是社会实践的一个组成成分并与其他成分构成辩证的关系,批评话语分析应该超越阐释主义和结构主义社会科学的对立,倡导“建构主义的结构主义”(constructivist structuralism)或者“结构主义的建构主义”(structuralist constructivism, 见 Bourdieu and Wacquant 1992:11),即话语实践既受社会结构的制约又是改变社会结构的生产过程。本文旨在简单梳理后现代主义关于文化、知识以及语言批评的一些核心思想,以管窥后现代批评社会科学的社会观和话语批评观。

#### 1. 后现代语境中的“文化”和“知识”

后现代主义是一个很难定义的概念,塞德曼(2001:

28)指出,“根本就没有一种社会知识的后现代范式。在后现代的旗帜下,有多种多样的研究方法和概念策略。”不过,“就抛弃某些关键的启蒙假设这一点而言,所有的这些方法和策略都具有某些类同或相似。”总体而言,后现代理论家都反对以特定方式来继承既定的理念,反对以各种约定俗成的形式来界定或者规范其主义。现代西方文化的核心是启蒙主义,理性被尊为至高无上的权威,而后现代主义把对理性的怀疑作为其最重要的标志。启蒙时代以来的理性被分为帮助人们摆脱蒙昧与恐惧的“人文理性”(human rationality)和帮助人们了解自然、规范生产的“工具理性”(instrumental rationality),两者在资本主义发展的初期相辅相成、和谐统一。但是,随着 20 世纪以来尤其是两次世界大战以后工业革命和科技创新的迅猛发展,科技理性逐渐取代工具理性并不断蚕食人文理性,由人类创造的科学技术通过标准化、统一性、整体性反过来控制了人们的思想行为与文化生活,人们必须不断地去适应科学技术。人被异化了。

在西方启蒙文化中,区分真理与谬误并且赋予科学以作为知识之特权的做法具有重大的社会意义。科学和知识一直以来都被与宗教、玄学、神话或意识形态等区分开来,而只有科学才能产生真理的主张,才能帮助人类获得进步和解放。科学与修辞以及科学与政治被置于对立的地位,这种对立以一系列相关的二元对立为基础,例如理性与情感、真理与谬误、现实与想象、意义与形式、主体与客体、主观与客观、男性与女性、心智与身体、知识与意识形态、在

\* 本文为作者“后现代语境下的批评话语分析”系列论文之一。

场与不在场、口头语与书面语、字面的与隐喻的等等。在这些对立中,第一项均被置于上位,因此科学是真实的、客观的、精确的和理性的,非科学则是虚构的、借喻的、主观的和非理性的。后现代主义的一个主要标志就是挑战启蒙文化中的这种二元对立和中心主义的各种主张。在后现代文化中,“科学与修辞以及科学与意识形态之间的界限变得模糊或者消失了;事实与虚构、知识与偏见、科学与文学、精确的与借喻的、理性与直觉以及男性与女性的层次被打乱,变得不稳定了”(塞德曼 2001:18)。

启蒙主义者认为,心智与客观外界是不同的,语言作为人类心智与客观世界的媒介可以反映或再现客观世界。受这种思想的影响,西方现代社会理论家一直在寻求一个可以反映社会并揭示其规律、普遍结构和逻辑的语言,他们往往将自己国家独特的发展和冲突投射到全球范围,仿佛这种特定模式具有普遍意义。但是在后现代主义者看来,所有这种思想和做法都应该被抛弃,因为它们压制了不同社会之间存在的重要差异,延续了西方世界霸权主义和民族沙文主义的愿望,它们只不过是为了认可某些社会模式的神话。后现代主义者主张摒弃这种自我的和动原的本质主义语言,将“自我”视为带有多种矛盾、多种社会关系和社会利益的统一体。利奥塔(2001)表达了后现代转向这一主题,即主体和社会领域的非中心化。在他看来,后现代的特点是在知识的领域摒弃了确定性,摒弃了支配社会及文化优越性和道德一元化标准的原则,不再那么迷信一个一元的和一致的自我:“后现代的知识不仅仅只是当局的工具;它锻炼我们对差异性的敏感性并增强我们容忍不可通约性的能力。”(利奥塔 2001:36)利奥塔认为在后现代的文化中知识会以两种形式存在,一是科学知识可能成为官僚化的社会操纵工具,二是知识的局限性、不确定性和不完全性会更加受到关注。这种后现代的科学知识将逐渐抛弃绝对的标准和普遍的范畴,使人们意识到并容忍各种社会差异、话语含混和冲突。

后现代社会的信息技术,尤其是传媒的发展,开拓了新的经历和知识渠道,使得通过电视和网络等手段与遥远的他人建立和保持联系成为可能,新媒体、新传播技术已经并正在继续广泛而深刻地改变着人类社会的传播生态。后现代主义理论因此聚焦于随之而来的不受时空局限的符号在经济和文化上的核心作用。Baudrillard(1983)指出,现实被这些循环的符号所构成的“虚拟物”(simulacra)所取代,这种状况既为人们创造了很多机会和可能性又带来了痛苦和

困惑,深刻影响了人们的自我意识和归属感,制造了极大的混乱和无意义感。在后现代文化中,社会领域之间的界限日益模糊或被重新调整,各“学科间的界限已变得模糊……科学、文学和意识形态之间,文学和文艺评论之间、哲学和文化评论之间以及高雅文化评论和大众文化评论之间的界限都已变得相当模糊,其变化之大足以令那些启蒙文化的卫道士们目瞪口呆。”(塞德曼 2001:3)“话语杂合”(hybridity)的可能性和程度急剧增加,“杂合”成为后现代话语的一个典型特征。“杂合”意味着一个语篇可有各种不同的解读,而且当人们把不同的话语带入自己对某一语篇的解读中并通过把当下解读的语篇与在阅读过程中带入的其他语篇相结合时,就创造出了一种新的杂合语篇,因此后现代社会的碎片化使得要维持意义寓居于语篇之内的传统观点变得异常困难。

在这样一个去中心化的碎片化的后现代文化中人们的生活越来越具有反思性,他们不得不对自己如何生活不断做出选择,运用关于社会生活的知识来改变社会生活是后现代社会的一个典型特征。为了更好地进行这种反思,人们越来越依赖专家(专家的文章和书籍等),对专家系统的有效性的信任和怀疑成了当代社会生活的一个典型特征。后现代社会无处不充斥着权力和随之而来的权力和知识的联系,包括技术和权力的联系。Foucault用“生物权力”(biopower)这个词来指现代的权力形式:“它‘把生活及其机制带入了直接运算的领域并把知识/权力变成了改变人生的动因。”(Foucault 1981:143) Foucault重点分析了学校、医院、监狱等社会机构中的某些微观权力技术,如教育和医疗中的考试与体检或检查等。他认为现代的权力并非来自外部的控制,而是持续不断的技术行为,各种各样的技术渗透到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并规范着现代生活。

总之,在20世纪下半叶当人类迈入后现代的文化领域时,知识成为了多样化的知识,同一性被视为零碎的、多元的和渗透性的,社会和政治失去了固定的中心;人们再也不是一味地去追求普遍性和真理,而是更多地去张扬个体、差异、异质、局部性和多元主义的价值观念,就像利奥塔(1979)所呼吁的,“让我们向一体性开战,让我们来为那些无法再现的事物见证;让我们来激发差异并维护这个名称的荣耀。”(转引自勒梅特 2001:360)

## 2. 后结构主义的话语批评观

“后结构主义”(poststructuralism)是上个世纪60年代以后法国知识界后马克思主义批判方法探索的产物,它是后现代人文研究和话语批评的一个最具

影响的起点。受战后西方哲学的语言学转向的影响,后结构主义强调语言和话语在形成主体性、社会制度和政治上的作用,其目标是挑战构成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和政治层次结构的基础的那些二元意义,其方法就是以 Derrida 为代表的“解构主义”(deconstructionism)。解构主义重视对差别、知识以及话语在社会政治生活中的作用,将许多社会问题归结为话语问题;正是后结构主义,尤其是 Foucault (1972,1977,1981) 在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中确立了“话语”(discourse) 这个概念:“后结构主义的知识就是(也仅仅是)语言,这个知识的署名就是话语。”(勒梅特 2001:361)Derrida 对西方文化中的许多经典文本所进行的解构性解读在欧美学术界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所谓“解构”就是消除和分解西方文化中以非黑即白的二元对立为基础的“逻各斯中心主义”,是后现代主义对结构主义的在场、秩序和中心整体性的一种反击。

解构主义摒弃“整体”思想,强调异质性、特殊性和唯一性,并对以任何形式透过语言传达的思想都进行解构,以便人们意识到思想的不稳定性和知识的无常,认识到对任何思想进行系统化、集体性的统一解说都是谬误的。不过,解构主义并非极端的反智论或者虚无主义,因为 Derrida 反对的并不是思想或者知识本身,而是对思想成为体系或者集结成为政治力量(例如各种意识形态)的反制。后结构主义者一般认为意义处于不断的流变之中,不存在终极永恒的意义;他们坚持能指与所指之间的任意性和差异性,提倡在文本的能指与所指之间建立非必然的联系,以扰乱固化的结构思想。在后现代的作品中人们开始经常可以感觉到一个看似熟悉的结构,然而很快这个感觉会被逆预见而行或独立于结构之外的意义所打乱。这类出乎意料或出其不意的元素有助于消解读者对结构的期待,打破结构主义的整体同一性,帮助培养读者的怀疑精神和多元心态。

虽然迄今很多人仍然认为在知识之外存在一个“真实的”世界,但后结构主义者对这种信念持强烈的怀疑态度。早在 20 世纪 60 年代伽达默尔就在寻求超越科技理性与科学方法控制范围的真理经验,他强调认识真理的两个关键概念:“偏见”和“视阈融合”(the fusion of horizons)。我们生活在传统之中,传统是我们的一部分,由于时间、空间和记忆的相互作用,我们总对传统产生偏见,偏见构成了我们的全部体验。所谓“视域”就是看视的区域,“这个区域囊括和包容了从某个立足点出发所能看到的一切。”(伽达默尔 1999:388)理解的过程总是涉及两种不同的

视域,即文本的视域和理解者自身的视域。文本有它自己的历史视域,是因为它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由特定历史存在的个人(作者)所创造出来的,理解者也有自己特定的视域,这种视域是由他自己的历史境遇所赋予的。而所谓理解无非是经验这两种视域的融合。视域融合意味着,理解既非由文本所决定,也非由解释者来决定,而是由二者的统一来决定的。伽达默尔十分赞同海德格尔的“人们不只在语言中思考,而且沿着语言的方向思考”的观点,他指出,语言是理解的普遍媒介,理解从本质上说是语言的,语言是一切诠释的结构因素,因此我们所认识的世界是语言的世界,世界在语言中呈现自己,所以我们掌握语言的同时也为语言所掌握,这个掌握的维度就是理解的界限,同时也是语言的界限。为了突破启蒙主义由理性、整体性、中心二元性、结构性等组成的理解的固化框架,伽达默尔和维特根斯坦先后提出了“语言游戏”(language game)的概念。在他们看来,语言,无论是口头的还是书面的,都如同游戏一样,没有主体、没有终极目的,说话者只是沉浸在语言的交流过程里,娱乐其中。这实际上是要求后现代的叙事语言淡化中心而注重外在的叙事技巧和开放式的结尾,以使读者从绝对理性的真理束缚中摆脱出来,还原语言的本体地位。

后结构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的 Foucault 反对启蒙主义将理性、解放和进步等同起来,认为现代性实质上是一种控制和统治的形式,主体和知识等都是它构造出来的产物。他从包括病理学、医学、监狱和性学等各个方面对这种控制形式进行了研究,旨在揭示知识、理性、社会制度和主体性的现代形式,认为这些看似自然的东西实际上是在一定社会和历史条件下的特定产物。Foucault 认为现代理性是一种强制力量,他特别关注个人是如何在社会制度、话语和实践中被控制和被塑造成社会主体的。在古典时期,人的理性从神学束缚下被解放,它试图在一片混乱中重建社会秩序。启蒙的理性神话用“求全求同”的虚幻来掩饰和压制多元性、差异性和增殖性。Foucault 用不可沟通性、差异性和离散性来对抗现代理性的压抑,认为那些组装我们话语理性的各种规则并不是普遍的和不变的,它们都将随历史的发展而变化,并且只对特定时期的话语实践有效。1970 年前后, Foucault 从对理论和知识的考古学研究转向对社会制度和话语实践的谱系学研究,即把话语置入社会制度和实践之中,揭示其中的权力机制。Foucault 认为“权力”是一个尚未规定的、推论的、非主体化的生产性过程,它把人体不断地构成和塑造为符合一定

社会规范的主体,它本质上不是压迫性的、而是生产性的力量。在 Foucault 看来,“知识”是与权力控制分不开的,任何时期的“知识型”同时就是权力机制。

Barthes 从结构主义转向后结构主义,提出了一种取消结构的文本分析理论。我们在阅读时总要追求作品文字后面的稳定意义,但是我们对一个文本的每一次阅读都会产生新的理解表明文本的意义就不是固定的,它随阅读的进行而变动。Barthes 认为符号就是符号本身,不代表任何事物,意义的结构是流动可变的,但这种变动是在一个框架之内,读者也在这个框架之内进行多价解释。因此,对文本意义的理解不是绝对的,而总是相对的。Barthes(2012)把对文本的理解过程分为“可读性的”(readerly)和“可写性的”(writerly),后者要求读者就像作者一样,去创作意义和我们的现实世界。Barthes 把文本置于与其他文本的联系中而不是与其作者的联系中,大胆宣布了“作者之死”这一惊世论断。在他看来,作者的话语不是源自于作者自己独特的意识而是来自于它们在语言文化系统中所处的位置,作者只是语言系统中先在的各种可能性的编纂者或排列者,他使用的每一个词,生成的每一个句子、每一个段落或整个文本都来自于语言系统,并因该系统而获得意义。巴爾特的上述观点就是人们后来所谓的“互文”语言观,即文本的起源不是统一的作者意识而是多个不同声音、多个他人话语。

在今天的后现代文化中,维持社会封闭已不再可能,政治、经济、文化的全球化和去中心化以及社会主体的碎片化导致了各种新的对立或对抗,而语言和话语在其中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包括批评话语分析在内的后现代话语研究通常把 Gramsci 的霸权理论和后现代的话语理论,尤其是 Derrida 的解构主义理论和 Foucault 的权力话语理论,相结合来探讨这种社会对立和对抗,认为 Gramsci 的所谓“霸权斗争”(hegemonic struggle)主要是通过不同的话语实践来表达和实施的,也即霸权斗争表现为争夺控制话语实践的斗争。因此,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斗争变成了话语内的斗争和争夺话语权的斗争。当然,这并不是说整个社会只是一个单一的霸权斗争领域,而是分成许多领域,而且这种斗争也不仅仅是阶级斗争,也表现为其他社会关系之间的斗争。

### 3. 后现代的批评话语分析

本文所勾勒的后现代社会的文化语境为批评话语分析研究提供了关键的主题和概念,例如“杂合”(hybridity)、“商品化”(commodification)、“全球化”(globalization)、“身份”(identity)、“反思”(reflexivity)等等,而 Gramsci, Habermas, Foucault, Derrida, Barthes

等的各种后现代主义理论对霸权斗争、全球化、知识和权力、语言和权力、生活世界的理性化,制度和生活世界的分离,制度对生活世界的殖民,以及各种社会运动对这种殖民的抵制与反抗等的阐释为批评话语分析提供了一系列的理论和研究课题,例如语言的商品化(Fairclough 1995)、技术官僚话语(Lemke 1995; Fairclough 1992)、官僚政治话语(Chilton 2004; Sarangi & Slembrouck 1996)、政治话语的媒体化(Fairclough 1995)、语篇的互文性与对话性(Fairclough 1992; van Dijk 2001)等等。

后结构主义重视知识和话语在社会政治生活中的作用,将许多社会问题归结为话语问题。批评语言学(critical linguistics, CL)一开始就对此有清醒的认识,主张语言并非一种客观透明的交际媒介,它对社会过程具有重要的干预作用,话语是一种社会实践,虽然其特点取决于社会结构,但话语却又反过来影响甚至建构社会现实。与 CL 相比,CDA 更加注重从具体的社会问题入手,探讨语言在其中的作用,因此,它“为研究话语与不同领域的社会文化发展之间的关系提供了理论和方法”(Fairclough 1995:30)。Fairclough 和 Wodak(1997)提出了 CDA 的三个目的:(1)系统地探索话语实践、事件和语篇与更广阔的社会文化结构、关系和过程之间的因果关系;(2)研究这些实践、事件和语篇与权力之间的关系;(3)探讨话语与社会的关系在维护权力和霸权中的作用。从 Chouliakari 和 Fairclough(1999:53-74)提出的 CDA 的五个步骤中可以清楚看出他们对社会问题中话语的作用的重视:(1)锁定一个与话语有关的社会问题;(2)通过对话语本身、话语所在的社会实践网络以及话语与该社会实践中其他成分之间关系的分析,确定处理该问题要跨越的障碍;(3)考虑解决该问题是否涉及社会秩序;(4)确认克服障碍的方法;(5)进行批判性反思分析。van Dijk(2001)认为,CDA 若要达到最终的目标,它首先应努力从社会互动和社会结构的角度来解释话语结构;其次,它应主要关注社会问题和政治事件;第三,它需要多学科的参与;最后,它主要应关注话语结构如何被实施、确认、合法化、复制,以及如何被用于挑战现存的社会结构和权力关系。从 Fairclough(1989)对撒切尔夫人的政治话语和因果“新经济”(new economy)和“新自由”(neo-liberal)话语的分析,到最近的 Sowińska(2013)对政治话语中评价意义的研究和 Vaara(2014)对欧元区危机的探讨,CDA 的实践者始终坚持着批评话语分析的上述目标和原则。

后结构主义者认为,一切知识都是通过描写而

获得的,是经过语言的中介被组织在话语中而领悟的。这样获得的知识并不是对现实世界的准确表征,而是处在不断变化之中,在不同的情境中,知识结构是需要被重新建构的。英国文化研究者 Stuart Hall 关于语言表征的观点与后结构主义如出一辙,对后来的批评语言学 and 批评话语分析产生了直接的影响。Hall (1997:1) 指出:“语言是一种文化中用于表征思想观点和情感的媒介之一。语言表征因此在意义声称过程中起着核心作用。”由于表征通常是对话性的,涉及共享的编码意义,因而没人能保证某一具体意义会是稳定不变的,正是当人们试图去坚持或维护某些意义的稳定性时,“权力介入话语”(Hall 1997:10)。Barker & Galasiński(2001:66)认为“出于具体目的去固化意义”可以被理解为意识形态。表征中意义的不稳定性意味着“意义的竞争性”(contestability of meanings, 见 Hall 1997:21) Hall 的这一思想促使后来的批评话语分析者对话语采取一种建构主义(constructivist)的态度,认为意义是借助“表征系统”(system of representation)拼装而成的。Kress(1983:45)指出,意识形态体系明显体现在建构话语表征的过程中对语言表达方式的选择上,这些选择反过来反映着说话者或机构的意识形态倾向。批评话语分析特别重视语言在知识表征中的中介作用:“话语的生成和理解离不开知识,而知识的获得和变化通常以话语为前提……在 CDA 与知识和话语结构关系的研究之间存在着一些明显的联系。”(van Dijk 2003a:87)以 van Dijk 为代表的大多数批评话语分析者接受后结构主义的相对主义知识观和真理观,认为不存在普遍绝对的知识 and 真理标准,“真理或者毋宁说真理或正当性的标准依赖于社会情景和社会条件”(van Dijk 2003b:95)。因此,“为了研究权力及其滥用,理解权力群体和机构究竟是如何管理并在公共话语中表达他们的知识就是至关重要的。”(van Dijk 2003a:87-88) 话语表征可以通过语言手段来背景化或前景化话语的某些方面(如施事、因果关系、责任等),以便支持或压制特定的意识形态(见 Fairclough 1995b:110; Alvaro 2013:291)。

后结构主义关于文本的开放性和意义的不稳定性令巴赫金的对话理论在欧洲大陆找到了肥沃的土壤,催生了“互文性”(intertextuality)这一重要概念。巴特与克里斯蒂娃的互文语言观令我们注意到先前语篇的重要性,传统上对话语自主性的强调不过是种误导,因为一部作品的意义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此前已经存在的语篇。互文性使我们认识到了此前语篇对产生各种意指效果的贡献,因而与其说互文性指的是一部作品与此前语篇之间的关系,不如说它

象征着对一种文化的话语空间(discursive space)的参与:一个语篇与一种文化的各种语言或者意指实践之间的关系,与表达那个文化中的各种可能性的那些语篇之间的关系。互文性分析始终是批评话语分析偏爱的分析工具。在批评话语分析的创始者 Fairclough(1989,1992,1995a)提出的批评话语分析框架中,互文性分析是话语实践分析的主要内容,是联系文本变化和社会实践变化的纽带。他将互文性概念与 Gramsci 的“霸权”(hegemony)理论以及 Habermas 关于生活世界的“公共领域”(public sphere)和“私人领域”(the private sphere of the family)的理论相结合,来解释语言变化和社会变化之间的关系(见 Fairclough 1992,1995a; Fairclough & Fairclough 2012)。

Wodak 建构的批评话语分析的“话语-历史方法”(the discourse-historical approach)充满了互文思想。她认为话语不是一个封闭的体系,而是开放的和“混合的”(hybrid)(2001),某一话语或话语主题会从一个“行为领域”(field of action)出发,扩展到另外的领域,从而各种话语或主题会在不同的领域彼此叠合、相互参照,而互文性指的就是特定语篇中不同的话语、行为领域或体裁特征的混合交融(见 Wodak 2001:66-67)。Lamb(2013)运用“话语-历史方法”从历时的角度分析不同社会领域中各种体裁对社会主体的表征,以揭示话语在行使权力和抵制权力中的作用。在《话语与社会》(*Discourse & Society*)2014 年总第 25 期上,Wodak 等以话语-历史的方法和互文性或者“再语境化”(recontextualization)的视角分析了不同行为领域中的各种话语在希腊危机中的作用(见 Wodak & Angouri 2014; Lampropoulou 2014)。批评话语分析的另一位代表人物 van Dijk 则强调研究理论和方法上的互文性,呼吁批评话语分析应兼容并蓄,采纳不同学科的各种不同的相关理论和方法,以更好地揭示语言、权力和意识形态的关系:“在避免折中主义的前提下,好的学问尤其是好的批评话语分析应该融汇不同学科、国家、文化和研究领域中的著名的或不著名的众多人的最好的成就。换言之,批评话语分析本质上应该是多样性的和多学科的。”(2001:95-96)van Dijk 本人对话语的研究不仅深受后结构主义关于知识、权力和话语的观点的影响,他也借鉴了社会学、心理学和认知科学等各领域研究成果,形成了自己的“话语-认知-社会三角”(the discourse-cognition-society triangle)方法,成为了批评话语分析中的主要理论和方法之一。

#### 4. 结语

后结构主义强调社会的开放性,这包括强调社

会差异、多样性和与批评“本质性”(essentialism)相关的社会身份的流动性。我们已经看到,这些社会特征在后现代主义的各种思潮中都与会话语实践以及社会的话语构成性质有关。社会生活本质上就涉及对话语开放性的限制、形成封闭的隔离以及固化差异和意义。强调差异性、多样性、流动性和相对性,对话沟通、求同存异,始终是后现代语境下话语研究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后现代主义尤其是后结构主义的许多理论和思想从形成之日就由于其自身的许多弱点而不断遭到批评,但与此同时人们也不得不承认这些理论和思想在一定意义上是人类后工业化时代的产物,反映了直到今天的一些社会现实。后结构主义关于真理、知识、语言、权力等的一些理论思想激发人们重新思考语言与现实的关系以及话语在社会中的作用,为各种话语分析尤其是批评话语分析提供了丰富的话题和理论方法,本文对此只能挂一漏万。

参考文献:

- 巴特. 2012. *S/Z*[M]. 屠友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 塞德曼. 2001. 后现代转向[C]. 吴世雄等译. 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
- 伽达默尔. 1999. *真理与方法*[M].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 勒梅特. 2001. 后结构主义与社会学[C]//塞德曼. 后现代转向, 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 355-378.
- 利奥特. 2001. 后现代状况[C]//塞德曼. 后现代转向, 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 35-50.
- 辛斌. 2004. 论理解的历史性和解释的客观性[J]. *四川外国语学院学报*(5): 73-77.
- Alvaro, J. J. 2013. Discursive representations of a dissident[J]. *Discourse & Society* 24(3): 289-314.
- Barker, C. & D. Galasiński. 2001. *Cultural Studies and Discourse Analysis: A Dialogue on Language and Identity*[M]. London: SAGE.
- Barthes, R. 1979. From work to text[C]//J. Hariri. *Textual Strategies: Perspectives in Poststructuralist Criticism*.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Baudrillard, J. 1983. *Simulations*[M]. New York: Semiotext(E).
- Bourdieu, P. & L. Wacquant. 1992. *An Invitation to Reflexive Sociology* [M]. Cambridge: Polity Press.
- Chilton, P. 2004. *Analysing Political Discourse*[M].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 Chouliarakis, L. & N. Fairclough. 1999. *Discourse in Late Modernity: Rethinking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M].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 Fairclough, N. 1989. *Language and Power*[M]. London/New York: Longman.
- Fairclough, N. 1992. *Discourse and Social Change*[M]. Cambridge: Polity Press.
- Fairclough, N. 1995a.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The Critical Study of Language* [M]. London & New York: Longman.
- Fairclough, N. 1995b. *Media Discourse*[M]. London: Edward Arnold.
- Fairclough, N. & I. Fairclough. 2012. *Pol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A Method for Advanced Students*[M]. Ox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 Foucault, M. 1972. *The Archeology of Knowledge*[M]. New York: Harper & Row.
- Foucault, M. 1977. *Discipline & Punish*[M]. London: Allen Lane.
- Foucault, M. 1981. *The History of Sexuality*[M]. vol. 1. Harmondsworth: Penguin.
- Hall, S. (ed.) 1997. *Representation: Cultural Representations and Signifying Practices*[M]. London: SAGE.
- Harvey, D. 1989. *The Condition of Postmodernity: An Enquiry into the Origins of Cultural Change*[M]. Oxford: Blackwell.
- Kress, G. 1983. Linguistic processes and the mediation of 'reality': The politics of newspaper language[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he Sociology of Language* (40): 43-57.
- Laclau, E. & C. Mouffe. 1985. *Hegemony and Socialist Strategy*[M]. London: Verso.
- Lamb, E. 2013. Power and resistance: New methods for analysis across genres in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J]. *Discourse & Society* 24(3): 334-360.
- Lampropoulou, S. 2014. 'Greece will decide the future of Europe': The recontextualisation of the Greek national elections in a British broadsheet newspaper[J]. *Discourse & Society*, 25(4) 467-482.
- Lemke, J. 1995. *Textual Politics, Discourse and Social Dynamics*[M]. London: Taylor & Francis.
- Sarangi, S. & S. Slembrouck. 1996. *Language, Bureaucracy and Social Control*[M]. London: Longman.
- Sowińska, A. 2013. A critical discourse approach to the analysis of values in political discourse: The example of freedom in President Bush's *State of the Union* addresses (2001-2008)[J]. *Discourse & Society* 24(6): 792-809.
- Vaara, E. 2014. Struggles over legitimacy in the Eurozone crisis: Discursive legitimation strategies and their ideological underpinnings [J]. *Discourse & Society* 25(4): 500-518.
- van Dijk, T. A. 2001. Multidisciplinary CDA: a plea for diversity[C]//R. Wodak. & M. Meyer. *Methods of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London: Sage: 95-120.
- van Dijk, T. A. 2003a. The Discourse-knowledge interface[C]//G. Weiss & R. Wodak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Theory and Interdisciplinarity*. London: MacMillan: 85-109.
- van Dijk, T. A. 2003b. Knowledge in parliamentary debates[J]. *Journal of Language and Politics* 2(1): 93-129.
- Volosinov, V. N. 1973. *Marxism and the Philosophy of Language*[M]. Trans. by L. Matejka & I. R. Titunik. New York: Seminar Press.
- Wodak, R. & M. Meyer. 2001. *Methods of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M]. London: Sage.
- Wodak, R. & J. Angouri. 2014. From Grexit to Grecovery: Euro/crisis discourses[J]. *Discourse & Society* 25(4) 417-423.

收稿日期 2016-12-16

作者简介 辛斌, 博士, 教授。研究方向: 语用学, 篇章语文学, 批评语言学。

(责任编辑 李德俊)

## Abstracts of Major Papers in This Issue

### Culture, Knowledge and Linguistic Criticism in Postmodernity by XIN Bin, p.1

The postmodern economic, political and cultural context provides multiple themes and concepts for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CDA) and social critical theorists such as Gramsci, Habermas, Foucault, Derrida and Barthes have cultivated a fertile soil for CDA with their theories of hegemony, globalization, knowledge and power, language and power, the life world and the public world, the colonization of the life world by system and the resistance to it, etc. On the other hand, critical discourse, with its focus on the role of language in the social change of the postmodern era, has made important contribution to the critical study of postmodern society. This article is the first of a series of three which relate CDA to postmodernism and root it in the postmodern social and cultural context.

Key words: postmodern, culture, knowledge, linguistic criticism

### Investigat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etacognition and EFL Listening of Postgraduate Non-English Majors: A Multiple Regression Analysis by SHEN Yunhua & ZHANG Jun, p.45

There has been a plethora of studies into the intrinsic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ese EFL learners' metacognition and their deployment of learning strategies. However, very few studies have thus far been conducted into relationship between postgraduate non-English major students' metacognition and EFL listening skills. Given that EFL listening has been a "Cinderella" in EFL instruction and yet it proves to be an increasingly significant language skill, we sought to fill the gap by conducting a study on 232 non-English major postgraduate students from a comprehensive university using CET 6 Sample Listening Test and MALQ. The study finds that: (1) Listening metacognitive awareness (i.e. MALQ Score) and the five aspects of metacognitive awareness significantly contribute to a valid prediction of participants' listening performance; (2) there is a lack of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male and female participants in metacognitive awareness; but (3) there ar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between HP and LP groups (pass or not pass CET 6) in listening metacognitive awareness and Person Knowledge subscale scores. These findings suggest that enhancing EFL learner's metacognitive awareness facilitates their listening abilities.

Key words: MALQ; CET 6; listening performance; metacognitive awareness

### Querying the Nature of Translation—How Culturalists Misunderstand the Reductionist Approach by ZHAO Yanchun & LV Lirong, p.64

After the "cultural turn" of translation studies, the culturalist memes have occupied a central position in recent decades. However, their postulates can be shown lopsided and misleading. For counterbalances, a reductionist approach was proposed to steer translation back to the assumed right way. However, this reductionist approach was counterattacked by the culturalist camp. After leafing through their conclusions, one may find that the culturalist critics misunderstood the reductionist approach in aspects of ontology, methodology and teleology. This paper takes the specific examples to illustrate their misunderstandings.

Key words: ontology; methodology; teleology; misunderstanding

### Multitextuality in "Biofiction" and Cross-Reading as an Interpretive Strategy by WANG Liya, p.92

As an increasingly popular segment of postmodern fiction, "biofiction" has drawn much critical attention due to its conscious juxtaposition of the biographical representation and the fictional re-writing of the subject. Informative as it surely is, this general perception of "biofiction" as rewriting of historical subjects and source texts may easily neglec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ts formal features and their cognitive impact upon reception and interpretation. Focusing on multi-textuality as a defining generic feature of biofiction, this paper explicates the agency of reading activity, which is both structured by the intertextual construction of biofiction and the reader's knowledge of those "pretexts" from which the current story borrows in a selective way. For this way of thinking, genre features of biofiction are not intrinsic to any particular biofictional text but rather a product of interpretation. To exemplify this argument, the paper chooses three texts relating to the writing and re-writing of V. S. Naipaul, revealing their mutual dependence in terms of "life writing".

Key words: biofiction multi-textual structure genre V. S. Naipaul